

恩格斯传承德国哲学的经验与启示

——基于文化现代化的视角

苏振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合肥, 230026)

摘要: 思辨哲学是德意志民族参与世界现代化初期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集中表达。它既是当时德国经济和政治实践相对落后的表现, 又蕴含着探索新型现代文明的历史愿景。恩格斯紧紧抓住德国哲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 一方面通过考察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以把握德国哲学“神秘外壳”的历史根基, 另一方面提炼与捍卫德国哲学的“合理内核”, 以避免考察现代社会的中介手段遭受近代形而上学的束缚, 最终锻造出指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理论。立足于文化现代化的主题审视恩格斯的实践经验, 对于当前我国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 传播先进文化潮流应与本国具体实际尤其是文化传统紧密结合; 提炼传统文化之精华应以时代脉搏作为根本尺度;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应着眼于其世界历史性意义。

关键词: 恩格斯; 思辨哲学; 现代化; 文化传统; “两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4-0025-10

列宁曾指出, 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1]。然而, 在以往的研究里, 三大来源往往只从其纯理论的形态上得到理解, 作为限定语的国别则被遮蔽了。事实上, 德国古典哲学既是一套思辨的概念体系, 也是德意志民族在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初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集中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不仅具有理论创新的划时代性意义, 而且蕴含着现代化语境中文化传承的向度。马克思在流亡巴黎以前, 他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德意志思想体系的内部批判。而同时期的恩格斯已然游历英伦, 较早地关注到了几个欧洲大国的社会状况, 并着手谋求各国最新文化思潮间的结合。这种结合能为德意志文化体系引入外部的思想资源, 促使其“推陈出新”。总体而言, 恩格斯传承德国哲学的历程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840—1844年, 恩格斯侧重于强调哲学思辨

对推进德国现代化的必要性, 并把宗教批判和传播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目标同传承德国古典哲学结合起来。1844年以后, 尤其是同马克思巴黎会晤以后, 恩格斯愈发意识到德国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德国哲学本身的改造, 由此转入对德国古典哲学“颠倒的”世界观的批判。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促使德国工商业实践迅猛发展, 也让这个民族逐渐抛弃了昔日的思辨传统。在此背景下, 恩格斯通过系统阐发德国古典哲学与最新历史科学、自然科学进展的内在联系, 呼吁人们重拾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总的来说, 恩格斯对德国哲学的传承既是一个扬弃旧文化, 使其与时俱进、重获新生的过程, 也是一个把本民族文化上升为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的过程。这对于我们今天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推进“第二个结合”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收稿日期: 2023-11-08; 修回日期: 2023-12-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重大问题研究”(19ZDA0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现代化视域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教学探索与实践”(WY2010000150)

作者简介: 苏振源, 男, 广东湛江人, 哲学博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联系邮箱: suzhenyuan188@163.com

一、廓清德国古典哲学的双重社会角色

学界通常认为,世界现代化的第一波浪潮开端于英国,随后逐步向西欧扩散^[2]。德国在这一时期虽已开启现代化进程,但其发展程度较之英国与法国还是相对滞后的。迈入19世纪初期,面对拿破仑军队的侵略,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诸邦“自上而下”地发起改革以救亡图存。由封建君主和上层贵族所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鲜明特点:政治上的相对保守使得德国先进知识分子阶层不得不退守纯思想的领域。恩格斯后来回忆道,“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而批判宗教的争论又是在“哲学幌子下进行的”^{[3](274)}。可见,德国哲学既带着纯思辨的形式,又是直接地参与现代政治变革的手段。思辨哲学作为一种进步的政治力量,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理解。

其一,从理论内容来看,它把人的目光从天国拉回自身,由此产生了宗教革命的政治效应。自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来,人存在的直接依据便不再是外在的上帝,而是作为思维主体的自我。对思维的内省代替了对彼岸事物的想象,也代替了对教会神权的盲目信仰。由省思所揭示的合理性,成为事物运转和人们行动的根本尺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尽可能地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治理国家,规避权力运用上的乾纲独断。同时,经过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洗礼,理性主体不再是一个“怀疑一切”的、代表纯粹否定性的空洞范畴,它内在蕴含着积极的、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伦理规定。在政治领域,由这一主体性所确保的自由也不局限于摆脱封建团体强权的消极自由,而成为一种追求自我发展,尤其是协助他人共同发展的自由^{[4](36)}。如此说来,德国思辨哲学不仅向封建思想与神学世界观发起了进攻,还包含着对业已展开的现代性哲学话语的省思与超越。

其二,从社会基础来看,思辨哲学并非只是脑海中的概念演绎,而是有着一定阶层力量的支撑。首先,思辨哲学得到了以弗里德里希·威廉

三世为代表的开明君主的支持。面对拿破仑军队侵略带来的国土沦丧的屈辱处境和历史记忆,德意志各邦不得不选择现代化改革的道路。以揭示事物内在合理性为目标的哲学因此成为国家的显学。其次,思辨哲学的精神得到了受君主任任、具体进行国家治理的技术官僚的推崇。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普鲁士业已开始运用专业技能考试来遴选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阶层对官员职位的垄断,同时也在全社会逐步培育出崇尚理性知识的风气。威廉三世时期,经过斯坦因和哈登堡两任首相的改革,“国家利益至上”成为改革派官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种认为自己应当“摆脱对出身的依赖、对工商职业利益的兴趣,根据科学的自我目的的普遍主义原则、整体原则来行动”^{[4](54)}的观念深入人心。最后,思辨哲学得到了大学师生群体的拥护。经由洪堡所主导的现代化教育改革,深究合理性被视为大学教授的至高义务,掌握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规律性知识也成为大学授课的主体内容。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德意志各邦的君主纷纷转向遏制现代化改革的保守立场,而大学师生群体依旧扮演着积极推进合理化的激进力量。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密切的青年黑格尔派也正是从这一群体中诞生的。

然而,德国思辨文化的发达,同其经济与政治领域的缺陷是并存的。与马克思、恩格斯交往密切的海涅曾赋诗讽刺道:“陆地属于法国人和俄国人,大海属于不列颠人,而我们在梦想的空中王国,却有着无可争执的控制权。”^[5]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英国业已通过工业革命确立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无上权威,法国业已借助政治革命推翻了旧的封建制度,德国却还处于邦国林立的“神圣罗马帝国”末期,直到拿破仑的入侵才促成旧帝国的解体。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时,德国还未形成统一关税的国内市场,尚不具备持续推进现代化的现实政治力量,马上又与欧洲各国一齐进入了漫长的复辟时代。为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评论道:“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6](4)}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乏力,使得他们更主要地退守思辨领域的耕耘,率先实

现了思想文化的现代化。

由于同充分发展的现代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德国知识界又得以更为客观、全面地审视英国和法国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德国思辨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批评道，英国古典经济学构想的由利己主义个人所组成的市民社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7](309)}，为法国大革命开辟道路的社会契约论也只建立在“单个人意志”^{[7](255)}基础上。与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观念相比，德意志民族更青睐伦理共同体和普遍合理性所确保的“真正的自由”。换言之，德国的思辨哲学家们并不主张简单地复制邻国的现代化道路，而是力图超越它，创建一种更具合理性的、更为完善的现代文明。因而马克思指认道：“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6](9)}不过，这种宏大的历史信念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表现为抽象的“绝对精神”的运动历程。及至费尔巴哈才充分揭示出其中“人是人的最高本质”^{[6](11)}这一现代价值追求。1844年8月马克思致信费尔巴哈，称其论断为初临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提供了哲学基础：“建立在人们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8]也就是说，马克思此时注意到，倒置的德国思辨哲学当中蕴含着通向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因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德国思辨哲学既是德国现实上尚未完全进入现代世界的表征，又是德国在目睹邻国现代化历程以后所力图构筑的更美好的现代文明蓝图。

1844年同马克思巴黎会晤以前，恩格斯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思辨哲学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他站在自由哲学的立场上揭露宗教世界观的谬误。1841—1842年，谢林应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邀请到柏林讲学，旨在遏制激进的青年黑格尔运动、维护神权国家的合法性。在认真旁听谢林讲座后，恩格斯撰写论文重申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历史意义：“迄今为止被称为宗教的东西的全部基本原则，都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土崩瓦解了……所有追随精神的自我发展的人，其神圣职责就是把已取得的巨大成果引进民族意识中去，使之上升

为德国的生活原则。”^[9]另一方面，恩格斯又热情拥抱英国和法国传播而来的共产主义学说，并试图推进这种先进思想与德国哲学的结合。从1843年10月开始，恩格斯积极地为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刊物《新道德世界》撰稿。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恩格斯比较了英国、法国和德国三者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主导因素。在他看来，英国人要求共产主义是由于国内两极分化、道德败坏等实践因素的恶化，法国人要求共产主义是基于其要求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的政治理念，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即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10](475)}。为此，只有从哲学的即普遍合理性的层面来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才能让目前推进德国现代化改革的激进力量即德国的改革派官僚和激进知识分子团体转化为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从而凝聚起现实的革命力量。

在恩格斯看来，德国哲学在德国现代化进程中担任着双重角色。从理论形态来看，哲学是求真之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德国哲学应当同各种不完善的世界观作斗争，不仅引领德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推动整个欧洲建立更合理的现代世界。与此同时，哲学思辨也是德国人习以为常的、看待现存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贯穿于民族的日常实践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任何理论要在德国大地上成长壮大，都绕不开这个“哲学民族”的文化根脉。从文化形态来看，恩格斯在此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同德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在1844年以前，恩格斯所着重寻找的还是两者的共通性，亦即来自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转译为德国哲学的语言。随着实践和思考的深入，他意识到两者的结合不应囿于两种思想体系间的“互译”，德国的哲学传统本身需要一场世界观上的革新，才能孕育出全面解剖现代世界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剥离德国哲学思辨的“神秘外壳”

对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而言，德国古典

哲学既表现为一种思维的内省,又直接作为政治革命的手段;既是德国发达的现代性文化的标识,又是其经济和政治相对落后的症候;既承担着批判“旧世界”迷思的职能,又蕴藏克服“现时代”局限的想象。初出茅庐的恩格斯尽管正确地把握住了思辨哲学的特性,却高估了它的历史潜能。与此相较,同时期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的判断要中肯得多。马克思看到,哲学思辨并非德国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主动之举,而是诸多历史形势规定的自发的综合。“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叙事式的。”^{[6](15)}所谓戏剧性的关系,即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社会的主导权有序地从封建地主向现代市民转移。德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当诸侯同君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入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6](16)}。各阶级谁也无法宣称自己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无法将局部利益上升为社会整体利益,也就无法承担起切实引领社会革命的任务,这便是所谓的叙事式的关系。这种历史形势根源于德国作为后发国家受外因驱动而开启的“自上而下”改革。从封建领主的立场来看,现代化改革的直接目标是图强自救,以应对侵略者和维系本邦国际地位;当外敌退去,尤其当欧洲均势的局面形成以后,它必然趋于反现代政治变革的保守立场。而从改革派官僚以及激进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它们与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有着明显不同:后者是切实握有社会财产的“资产者”,而前者只是“有教养的社会阶级”;后者通过调动手中的财富直接运转社会权力,而前者只能通过向上层阶级提供知识服务的方式间接地参与权力决断。因而,德国思辨哲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基础必然是软弱的。由于没有现实地掌握社会生产资料,德国资产阶级只好依附于所谓的“开明君主”。这种矛盾的立场在黑格尔哲学中十分明显,他一方面把王权至上作为政治国家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强调以逻辑演绎的方式来论证王权的合理性^{[7](286-287)}。为此,恩格斯晚年批评德国思辨哲学“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3](272)},是新旧力量相妥协的产物。

青年恩格斯之所以对思辨哲学期待过高,是因为他最初还是站在既有的德国哲学内部思考问题的。其立场接近于马克思所指认的“理论政治派”:仅从思辨哲学的前提出发,停留在它所提供的结论或直接要求^{[6](10)}。在1842年年底为《莱茵报》撰写的文章里,恩格斯强调哲学原则的优先性,否认物质利益可以“作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10](407)}解释历史,这显然与马克思的相关分析的出发点并不相同。直至前述《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恩格斯的主要看法仍未改变,即要求在不触动思辨哲学之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哲学共产主义”。在1844年年初写就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里,恩格斯的思路有所转变。他不再把德国哲学内部的抽象原则作为尺度。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及其物质利益至上的理论倾向,不再只是受哲学原则贬抑的对象。它自身独立地构成了理解英国现代化的线索,并且反过来塑造着欧洲大陆的历史,“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10](532)}。在此,恩格斯没有在物质利益和一般原则两种理论出发点中二选一,更不是简单地“头足倒置”。在他看来,从物质利益出发也罢,或者从抽象原则出发也罢,只是不同的民族根据其历史形势的不同,在应对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这不是简单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而是“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11](602)}联系中理解社会现象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恩格斯开始注意到,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哲学,并透过哲学把握被颠倒的社会发展史。

按照《英国状况·十八世纪》的看法,“社会”是同“政治国家”相对立的范畴,它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诸个体的集合。这种觉醒起初以一种极端的个人利益至上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产生了英国那种把个人感性放在第一位的经验主义哲学。个人的原子化不只是精神世界的抽象,它以私有制作为存在前提。因为只有预先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才能把社会总体划分为若干彼此排外的、相互对立的个人的利益。反过来讲,个人主体的自我认同,实则通过私有财产的自我认同,是将自我认同为财产。如此一来,“社

会”的产生同时意味着私有财产对人的全面的统治。同中世纪相比，“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12](534)}。以此来看，现代社会只是较之于中世纪的解放，却还没有达到完全意义上的解放。那么，英国的社会革命及其哲学意识形态是历史发展之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同时又是一个应当予以扬弃的环节。

但是，这一扬弃的过程无法轻易为德国哲学所消融。相反，恩格斯认为，德国直接从总体出发的思辨逻辑表征着前现代的意识形式，预示着“社会因素还完全隐藏于政治因素之下，还丝毫没有和后者分离”^{[12](532)}。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法哲学把伦理国家当成历史运动的终点和思辨的顶点，它本身不再受到理性的批判；相反，思辨理性只是对其自我实现历程的展开。伦理国家本身的历史根基被遗忘了，表现为具有自律性的神秘主体。作为其环节的“市民社会”也不过是思辨体系的自我复现。如此一来，黑格尔法哲学尽管力图提出超越英国现代社会的文明想象，却止步于对个人自私自利的伦理谴责，不能解释其历史形成的原因以及支配这一过程的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自然也难以找到现实的扬弃市民社会的道路。要剥去德国哲学的“神秘外壳”，就必须在考察现代社会形成历程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检阅德国哲学自身的思考基点。而要考察现代社会的形成历程，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当时现代化最为发达的英国。换言之，不能简单地把德国哲学的原则“应用于”英国社会批判，唯心主义地揭示出英国社会的“未来”。而是要从英国现代化的经验中提炼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定，并且在其中勘定德国哲学的社会基础及其思想源流。这一工作既涉及对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考察，也涉及对各国哲学发展谱系的考察。青年恩格斯通过大量的实证调研和一手材料主导推进前一个方面的研究。马克思则凭借其哲学专业功底，在《神圣家族》中勾勒出后一方面的大致脉络。恩格斯后来将两人所共同创立的新世界观概括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295)}。

从“现实的人”出发，意味着把它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历史活动的前提，意味着包括哲学在内的精神活动只是第二性的。恩格斯不满足于确定一般哲学的根基，他力图追溯德国现时代哲学的特殊起源，即要在社会发展史中理解为何意识和精神会被当成一个不依赖于物质生活环境的独立王国？何以它们会表现为神秘的自主运动的主体？恩格斯与马克思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生产力与分工形式的矛盾关系来回答这些问题。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社会历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分工形式。这一分工意味着一部分人脱离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专心从事精神世界的生产。随着分工的日渐专门化，脑力劳动者遗忘了他们的工作对象的真实源泉，于是种种观念范畴之间好像具有一种独立于物质生活的自主联系。由于体力劳动者主要从事直接的物质生活生产，无暇对其主观世界予以批判，于是只能被动地接受脑力劳动者所提供的想象。如此一来，脑力劳动者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就上升为全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彻底被遮蔽了。

每一个阶级内部都有它们各自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因此阶级间的斗争也集中地表现为思想的斗争。由于进行革命的阶级总是打着代表全社会的幌子而登场的。在社会分工持续精细化的一般发展趋势下，越是晚近的革命，它所力图代表的社会总体就越是复杂，在思想层面就表现为“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6](522)}。社会意识在思辨中的普遍性的生成，与社会存在日益的普遍化进程是一致的。黑格尔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既是人类普遍交往开辟世界历史的反映，蕴含着超越个别阶级特殊利益、把握人类普遍利益的宏大愿景，又以其思辨的形式掩盖着现实的阶级斗争，让人们误以为一切对立都能轻易地消融于哲学逻辑的漩涡之中。这就要求新生的无产阶级一方面要借助德国思辨哲学所暗含的总体性观念，克服现代社会分工所造成的原子化个人的对立；另一方面又要超越德国哲学的思辨特性本身，不仅从观念上，而且

在实践和行动中,紧密地联系起来,才能开创惠及全人类、更具普遍性的新型现代文明。

三、捍卫德国哲学遗产的“合理内核”

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德国资产阶级开始获得国家现代化的主导权。然而这一过程又伴随着某种程度的矫枉过正:从思辨转向实践的德国人抛弃了他们的哲学传统。一方面,1848年革命并没有让德国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重复了英国和法国那种受资本主义经济宰制的现代化模式。个体与个体间彼此对立、“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市民社会在德国也日益成熟。恩格斯为此感慨:“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3](313)}如何穿透这种个人至上的表象,辩证地把握社会历史的总体,进而锻造出引领工人阶级消灭内部对立、走向联合的科学理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进历史科学,尤其是推进政治经济学与德国哲学传统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德国人对自然科学的热情钻研使得他们日益受到形而上学思维的束缚。何以至此呢?恩格斯给出的解释是,从15世纪下半叶起,人们日益把自然界分解为若干部分,并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建立起不同的部门科学。这种做法有助于深入研究自然界的细节,是自然科学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前提。但它也带来了消极方面:“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13](24)}可见,自然科学研究并不是必然会引向形而上学,而是就其起步阶段而言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形而上学思维的介入。为此,恩格斯绝非要求刚刚迈入现代世界不久的德国放弃自然科学研究,而是要探讨如何将它与德国哲学传统的合理方面结合起来。

《费尔巴哈论》以系统阐发黑格尔哲学的方式,揭示了恩格斯心目中的“合理内核”:“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

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3](269)}首先,黑格尔始终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事物的运动,而不止步于某些既定的观念或结论。其次,黑格尔对于既有观念的批判并非简单地从其正题走向反题,也不是支离破碎地对待各个观念,而是找到观念与观念间“由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上升”的规律体系。最后,由批判旧观念所形成的新的观念,尚待接受进一步的批判。一旦将其当作绝对真理,便会落入思辨形而上学的窠臼。当黑格尔本人建立起绝对理念的体系时,他就违背了自己开辟的方法。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正在于祛除了德国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成分后,还保留了其中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1848年以后,恩格斯一方面继续延续着在实证科学基础上考察现代社会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把新生的德国辩证法贯穿于种种实证科学的研究之中,从而使得考察现代社会的中介手段具有科学性。

其一,恩格斯系统阐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承关系。1859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问世。恩格斯应邀为该书写评论。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在德国起初是舶来品,资产阶级的学究和官僚们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做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11](596)}。只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后,独立的、科学的德国经济学才得以诞生。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发现在于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恩格斯实际上指出了唯物史观的两大要件:其一是从物质生活出发,其二是要整体地把握社会。前一个要素,是马克思恩格斯改造德国思辨哲学的立足点。后一个要素,按照恩格斯的追溯,直接来源于黑格尔哲学当中“巨大的历史感”。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11](602)}。从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出发,其方法论上的要求便是时时刻刻在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来理解个别。因此,马克思既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那般把利己主义个人当成不证自明的历史起点,也没有沉溺于拜物教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不论是个别的人还是个别的物,它们仅仅

作为一定的历史结果而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的目标是透视其历史的由来，把握它同其他事物、其他人之间生动而现实的联系，以便在思维中再现社会的总体面貌。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从商品这一“最简单的关系”出发，逐步上升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批判，与内在的方法论同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恩格斯多番回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德国哲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虽然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述，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正面揭示它与德国哲学的关联，反而严厉批判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流行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潮。这就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仿佛社会主义运动不需要哲学理论支撑，只需借助政治经济学等实证科学的论据就够了。后来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更是把德国哲学贬斥为一种空想的目的论，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应当彻底与哲学决裂^[14]。恩格斯晚年已然注意到这种误解，并试图澄清德国哲学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他指出，社会主义学说是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各项原则的推进。启蒙哲学总是颠倒地、从“理性王国”的一些永恒原则出发。然而这些原则只是资产阶级对它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抽象，于是所谓“理性”的实践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公。空想社会主义只是推进了启蒙的原则，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只有吸收德国辩证法那种以历史眼光批判既存理性观念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运动才不被理解为“绝对真理”无条件地“征服世界”的空想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12](495)}可以说，在创立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历程中，恩格斯始终没有放弃青年时代所确立的推进社会主义学说与德国古典哲学相结合的总体设想，始终未曾改变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

其三，恩格斯力图借助自然科学发展史来阐明德国辩证法的历史生成，并要求以辩证的自然

观来引领自然科学研究。古希腊时期固然出现了一种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总体的思维方式。但在恩格斯看来，古希腊的辩证法还处于质朴的阶段，它只看到世界的“总画面”，未能把握它的“细节”。要把握这些细节，就必须对世界进行专门的、深入的钻研。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开始于15世纪下半叶，这同时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思维开始流行的时期。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本身也在冲破形而上学的桎梏。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是：自然界是自在的、不变的，始终如一的。因此近代科学的任务只是把它拆解成若干个部分，分别进行研究。这种僵化的自然观首次由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打破，随后又被赖尔描述地层渐进变化的地质学研究所证伪。物理学领域的能量守恒定律、化学领域用无机方法制造有机化合物的突破、生物学领域物种比较研究与进化论学说的创立等等，使得原先分门别类的研究的界限被不断突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辩证的自然观：“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東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3](418)}黑格尔无所不包的思辨哲学体系，本身就广泛吸收了近代以降的自然科学成果。在此情形下，尤其在1848年革命后德国群众以空前热情投身自然科学实践的背景下，“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12](496)}成为一项必要且有效的手段。

四、恩格斯传承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启示

跳出纯粹的哲学概念史研究的学科范式，恩格斯对德国哲学的传承实则也是对于以思辨为精神内核的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发展。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把握抽象的哲学真理，而是试图从德国的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中寻觅更合理的现代化道路。这一过程既是德国文化的现代化，也是现代文化自身的革故鼎新。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它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进程中，不能照搬照

抄恩格斯扬弃德国哲学时所作出的个别论断,而是要回到两个民族、两个时代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这些论断的确切内涵。另一方面,尽管两种文化传统的具体内容不同,两个民族所面临的“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主题是相近的。立足于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总目标来回顾与提炼恩格斯的文化遗产经验,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和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都富有启发性意义。

首先,传播先进文化潮流应与本国具体实际尤其是文化传统紧密结合。对于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且微弱的德国来说,在邻国业已兴旺的社会主义学说无疑是更为先进的思想形态。不过,在接受这一先进文化潮流时,知识界起初表现为一种失语的状态。连马克思也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11][591]}一种文化必须在另一种文化传统中找到自身的定位,才能对后者施加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学说在德国早期的传播主要地表现为两种文化体系的“互译”,亦即将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主张“翻译”成德国人耳熟能详的哲学共产主义话语。恩格斯既肯定了这种方式有利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又敏锐地看到其中的根本缺陷:德国思辨哲学本身就是头足倒立的,经它转译的社会主义学说仍是空想。因此,不仅需要不同文化传统间的结合,还要借助这种结合将两者提升到新的高度。

中国在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早期也面临着不同文化传统间的碰撞和结合问题。最初是西方的自然科学话语被转译为中国传统的表述方式。例如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研究归入“格物”“博物”的行列,用天干地支来表述代数符号,等等。随后,以维新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试图在儒家经典中寻求君主立宪政体的“道统”依据。在这些结合里,中华文化传统主要地还是发挥着“便宜说法”的功能。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文化的弊端日渐显露,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再次凝聚。梁启超考察欧洲归来后写道:“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

种新文明。”^[15]历史证明,“新文明”的产生并非通过东西方文明泛泛的“化合”。一方面是西方文明中最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经由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所检验了的中华文明中的优秀文化传统:两者的充分结合才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新形态。在此过程中,科学的“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有效扎根本土的必要途径,也是本土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得以传承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次,提炼传统文化之精华应以时代脉搏作为根本尺度。19世纪上半叶流行的德国哲学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落日余晖尚未散尽。炽盛的一神教信仰、认为本民族承担更多神圣使命的自傲情怀等等文化基因渗透到哲学体系的创建之中。其典型表现是黑格尔既坚定相信世界历史必然有其内在统一的规律性,又天真地想象着世界精神最终必将栖息于日耳曼大地,届时德国将摆脱落后重新超越它的邻国。二是现代文化随着拿破仑军队的铁骑广泛传播,“清扫了德国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6]。法国启蒙思想中的自由、民主、理性等原则至少在话语表层替代了神学世界观和权力神授论。其表现为费希特、黑格尔等人在谈及本民族的优越性时,也不再直接诉诸神秘的上帝,而是从语言体系、文化传统或制度设计等方面予以论证。三是对现代世界的阴暗面的反思。以费希特、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都力图克服英国市民社会的自私自利,都试图避免法国大革命无序与混乱。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德国文化的改造方略及其社会后果也是不同的。恩格斯放眼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紧紧扣住“社会主义”这一代表现代文明最前沿的实践目标,将它作为传承什么、如何传承的根本行动指南。

除此之外,恩格斯还注意到了德国的文化传统自身也有其时代律动。19世纪上半叶,德国流行的是哲学,他便应时顺势地推进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化。到1848年革命以后,德国人对实证科学的兴趣一度超过哲学,他又力图借助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来阐发德国哲学的合理方面。这种灵活的宣传策略是辩证方法的表现。恩格斯不仅

考虑到世界历史整体的进步趋势，而且充分考察了个别文化形态自身的发展进程。换言之，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个别文化传统并不是一个僵死的、不变的、消极的对象。这就注定了“结合”不可能以教条的形式进行。“结合”也不能理解为单方面的“灌输”，或者部分西方左翼学者所以为的“强制同一性”。中华文化历史悠久、绵延不断，其自身内在地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发展韧性。它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更新其自身的形态和内容。在此意义上，“结合”的结果绝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相互成就，造就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7]。

最后，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应着眼于其世界历史性意义。资产阶级时代同以往时代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识就在于世界市场的建立。物质生产的全球化带来了精神生产的全球化。《共产党宣言》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11](35)}然而这种世界历史性文化的内部是不平衡发展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占据着物质力量上的统治地位，其意识形态幻想也随着商品和资本在全世界遨游兜售^[18]。资产阶级在一切民族间推行以自身为尺度的现代文化，“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1](36)}。这意味着，在部分文化传统成为世界主流的同时，也有部分文化传统被边缘化，降格为流行文化的附属品。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哲学传统一度被湮没。面对这一逆境，恩格斯的主要措施不是唤醒德国人的民族感情，而是在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哲学斗争史里理解德国哲学的深远意义，通过阐发辩证法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来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发扬德国哲学当中的先进方面。其结果是，德国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不仅在德国、西方或者在资产阶级主流文化内部，而且在东方、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历史进程里传扬不息。

中华文明曾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里倍受冲击。正是借助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迈向复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

东总结道：“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9]其主动性表现为以高度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投身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方面，民族复兴始终是近代中国不懈探索的主题。借助一定的民族形式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是实现该目标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恢复它“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0]的国际责任和历史担当。今天，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复兴的目标。它的“较大的贡献”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反哺世界，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里不断推动后者的理论创新，锻造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谋求世界各国各民族携手进步、共同发展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如何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持续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主要思想资源的巨大潜能，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亟待攻关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 [1] 列宁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
- [2]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 增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2.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李工真. 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M]. 3版.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文学典故注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90-291.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3-74.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40.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9.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陈爱萍.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 时代、问题与批判[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2-83.
- [15] 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49.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214.
- [17]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 4-11.
- [18] 钟启东.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思想[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1): 11-20.
- [19]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16.
- [20]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下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947.

Experiences and inspirations of Engels' inheritance from German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odernization

SU Zhenyuan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Abstract: Speculative philosophy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formed by the Germany's participa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It is not only a manifestation of Germany's relatively backwar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actices at that time, but also contains a historical vision of exploring a new modern civilization. Engels firmly grasps the dual role played by German philosophy in its modernization. On the one hand, he masters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the "mysterious shell" of German philosophy by examin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he subtracts and defends the "reasonable core" of German philosophy to prevent the intermediary means of exploring modern society from being bound by metaphysics, hence ultimately forging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that guides the worldwide socialist movement. Examining Engels' practical experience on the basis of the theme of cultural modernization ha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disseminate advanced cultural trends, we should closely integrate it with the specific realities of the country, especially cultural traditions; To extract the positive ones in traditional culture, we should take the pulse of the times as the fundamental criteria; And to promote excellent cultural traditions, we should focus on their glob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Engels; speculative philosophy; modernization; cultural traditions; "Two Combinations"

[编辑: 胡兴华]